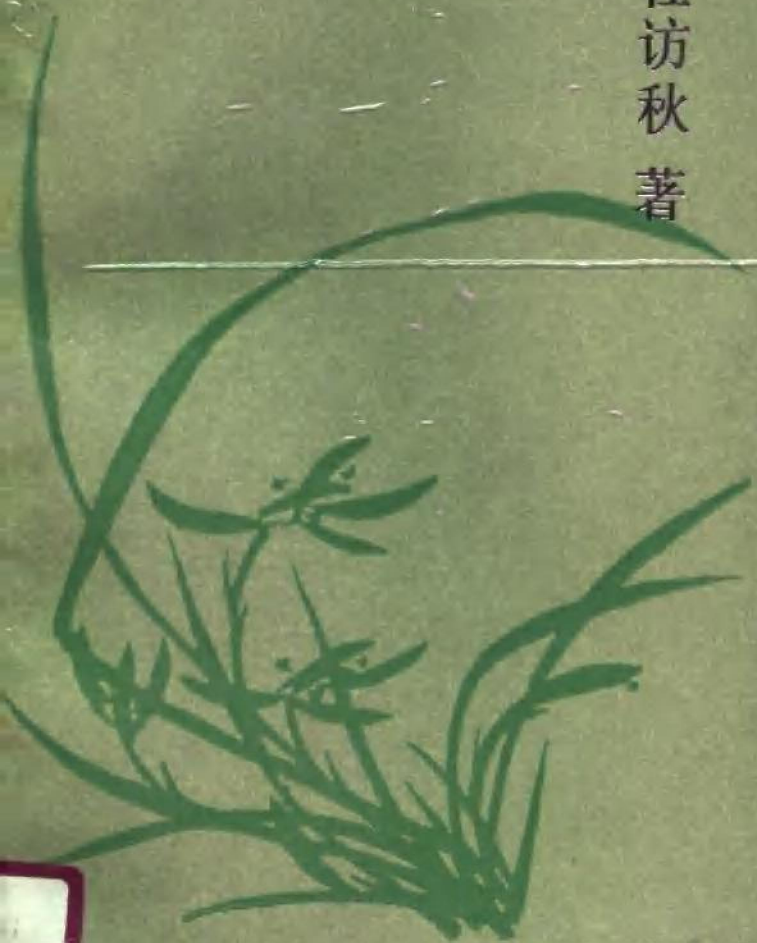


中國古典文學論文集續編

任访秋 著



383

中国古典文学论文集续编

任访秋 著

责任编辑 理衡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开封市明伦街85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封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1/32 印张: 12.125 字数: 304千字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定价: 4.80元

ISBN 7—81018—481—4 / I · 45

目 录

继承灿烂的祖国文学遗产	(1)
简论中国文化遗产中民主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8)
贾谊论	(16)
司马相如论	(21)
曹植论	(28)
阮嗣宗论	(39)
嵇叔夜论	(46)
王绩论	(60)
韩愈论	(71)
柳宗元论	(81)
关汉卿论	(88)
何景明论	(98)
夏曾佑论	(113)
庄学与魏晋以来几位杰出的诗人	(133)
苏轼谪居黄州后的生活、思想与创作	(150)
从《歧路灯》看作者李绿园的思想	(158)
略论吴敬梓的学术思想	(173)
从《聊斋》中几个妇女的典型形象 看蒲松龄的妇女观	(193)
反儒欤？尊儒欤？	(200)

试论龚自珍的散文	(206)
龚自珍与晚清诗坛	(227)
曹植诗三首简析	(240)
从《洛神赋》看曹、甄二人的恋爱关系	(244)
《水经注》与游记文学	(248)
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	(255)
《三国演义》与正统论	(262)
漫谈《歧路灯》	(269)
重读《病梅馆记》	(278)
晚清一部宣扬封建婚姻观的小说——《恨海》	(283)
纵横·辞赋·隐逸·俳优	(295)
谈“真”与“诚”	(298)
中国作家对大自然认识的发展	(310)
恽敬的古文文论及其与桐城派的关系	(316)
王国维《人间词话》与胡适《词选》	(327)
略论西汉黄老之学	(338)
近现代学者论治学方法	(350)
谈谈《左派王学》	(359)
关于个人治学的回顾	(365)
后记	(374)
附：任访秋教授论著目录索引	(375)

继承灿烂的祖国文学遗产

从历史上看，每个民族都有从古以来祖宗所遗留下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其民族的前途，全看其能否正确地继承它，并进一步加以革新、提高、发扬光大。

文学，是每个民族精神财富中重要的一部分，它是一个民族的心声，一个民族灵魂的体现。因而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学遗产，对后世子孙会有着极大的感发兴起与激励振奋的教育作用。一个民族即令在某个时期遭到外来民族的入侵、统治与奴役，假如这个民族的文学不灭亡，那么这个民族终将有复兴之日。即以我国而论，在清代末叶，革命志士为了推翻清王朝，多用汉民族的古文学，作为唤醒人民觉悟、激发其同仇敌忾的手段。伟大的作家鲁迅，正是为挽救祖国的命运，才弃医从文，从事倡导文学革命运动的。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从诗歌有记录的时候算起，也有三千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不知有多少圣贤豪杰、文人学士，因时因事，触物兴感，呕心沥血，谱写了反映个人遭遇、人民生活以及时代精神面貌的绚丽篇章，为后人留下了极其灿烂辉煌、丰富多采的精神财富。因此，对这份宝贵的遗产，我们必须加以珍惜、继承。至于如何继承，我认为根据各人在工作中的分工不同、个人兴趣爱好的差异，而应有所区别，一般说来，人们对于文学的态度，大致可分为三种不同的情况，即研究、创作与欣赏。

就研究来说，不论是从事现代文学或外国文学的研究，都不应抛开古典文学。先就现代文学来说，它是从古典文学发展来的。假若把中国文学史比作一条长河，那么先秦时期的《诗经》、《楚辞》就是源，而汉以后的就是流。同时历代大作家，他们在创作上的成就，很少不受到祖国文学的陶冶、培育的。杜甫自称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龚自珍曾说过：“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至于现代大作家鲁迅、郭沫若，不也都是深受庄、骚的影响吗？鲁迅的旧体诗，在创作方法以及写作手法上之渊源于《楚辞》，是显而易见的。说到郭沫若，情况也是如此，他热爱屈原，以当代屈原自命，就很可以说明问题了。可见我们研究现代文学，如果对古代文学毫无所知，那是很难研究得透彻的。

其次是创作，当代作家是不是需要读点古典文学的作品呢？我认为需要。不仅要读中国的，而且应该读点外国的。不如此，不能开扩自己的胸襟，扩大自己的视野，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一个作家须有崇高的思想和丰富的生活体验，但渊博的知识，也是绝不可少的。鲁迅在“五四”后，曾经一度反对过青年读古书，而在30年代，又曾经批评过某些人提倡从《庄子》和《文选》中去寻词汇，我认为他这种反对，在当时是必要的。因为20年代初，文学革命的高潮刚过，复古派又卷土重来。到了30年代，那些提倡到《庄子》和《文选》中去寻词汇的主张，就现在看来，也是荒谬的。因为创作，正如鲁迅所说：“以文字论，就不必要在旧书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渊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不过鲁迅这个话，是就创作语言来说的，没有涉及创作方法与写作手法。鲁迅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对中国古典小说在结构、语言以及各种写作手法的运用上，论述得非常清楚。这不正是给从事创作的人指出，在阅读古人作品时，应该注意学习的要点吗！

至于说到欣赏古典文学，值得选读的作品，数量也是很多的。即令不是从事文学研究和创作的，也应接触一下祖国文学宝库中的杰出作品。从这些作品中，可以了解我们民族过去的生活情况，以及各种类型的人的思想感情，特别是那些杰出人物——我们民族的脊梁，他们崇高的思想、坚强的意志和伟大的人格。正是由于他们艰苦卓绝的奋斗，才使我们民族经过许多挫折和苦难之后，有了光明幸福的今天。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了解过去，正是为了更清楚地了解现在。总之，从古典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社会的发展，也可以看出广大人民的愿望和斗争的方向、道路，从而树立起建设四化、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信心。

从以上意义上说，《百花园》编辑部组织中国文学史讲座是很有意义的。那么，我们学习中国文学史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下面我想讲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 文学与政治形势的关系

文学与政治形势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它一方面反映出政治形势所影响于人们精神与生活的具体情况，同时又受到政治形势的制约。从反映政治形势来看：《诗大序》中说：

情发于声，声成文（指宫、商、角、徵、羽五声之调）谓之音。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反常），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这充分说明，有什么样的政治现实，就产生什么样的文学作品。

另一方面，文学也受政治形势的制约。即如汉武帝喜欢辞赋，一时辞赋作者辈出。曹氏父子提倡文学，而建安文学盛极一时。到唐代以诗赋取士，而唐诗成为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元人

重戏曲，而元杂剧文章古今无二。相反的，清初大搞文字狱，而文学衰敝，形成“万马齐喑”的局面。30年代，蒋介石发动文化“围剿”，于是遂如鲁迅诗中所说的：“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殚。”当时整个文坛上出现了一派凄凉萧条的景象，可见，文学与政治互为消息，是千真万确的。

二 文学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文学的发展，一般说来是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异而变异的。但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两千多年，直至1949年全国解放，经过一场全国性的土地改革，这样才算消灭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但是代表封建地主阶级的封建文学，却在“五四”文学革命时，它的作为文学正统的地位就已经被推翻了。由此可知，文学与社会经济制度，并非如影之随形那样的关系密切。但是必须指出，进步的文学产生，必须基于进步思想的出现。没有思想的解放，决不可能有文学上的创新。但进步思想的产生，也须源于新兴阶级的出现。而新思想新文学，正是为每一个新兴阶级的发展壮大而鸣锣开道的。

中国宋元明以来的杂剧、传奇，以及平话小说的勃兴，特别是明中叶以后公安派的反复古运动，直到清初出现的几部杰出的小说如《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其所反映的先进思想，都代表了当时市民阶级的思想，而这与宋以后商业发达，较大城市的人口集中与市民阶级的兴起，是有着极密切关系的。

至于晚清维新派所提倡的文学革新运动，以及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运动，则由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的缘故。正如陈独秀在谈到“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时说：

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

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要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火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①

三 作家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

《共产党宣言》指出：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

任何一个作家，没有不是随着生活条件、社会关系、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在创作上产生变化的，这是一条规律。屈原不遭到放逐，决写不出《离骚》；司马迁不因李陵而下狱、受到宫刑，也写不出宏博的《史记》，作家由于世界观的巨大变化，表现在创作与文艺观上，形成先后判若两人的情况也不乏其人，最突出的，如晚清的刘师培，前期是一个革命者，因而在观察分析客观事物上，观点是唯物主义的，但到后来投降了清王朝，在观点上便走到了前期的反面。他的诗歌，前期是慷慨激昂、热情奔放，洋溢着推翻异族统治与挽救祖国危亡的爱国激情；而后期，很多作品是连篇累牍地堆砌典故，令人读来不知所云。由此可见，马克思所说的人们的意识是随着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是多么的正确！

四 文学与时代思潮的关系

所谓时代思潮，即在一定时代或时期所盛行的一种思想潮

① 《科学与人生观序》。

流，这种潮流必然要影响到文学，因而在文学的内容与风格上，形成一种异于过去的独特风貌。

即以战国而论，当时思想界曾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反映到文学上，于是史传文学、论辩文学蓬勃兴起。而在诗歌上，继《诗经》之后，楚国的辞赋成就尤其辉煌。究其原因，在于社会经济制度的巨大变革，政治上周室的衰微，诸侯的争霸，因而思想上来了一个大解放。当时的百家（后人总结只不过九流十家），虽然意见纷歧，互相攻伐，但总的说来，不外乎（一）总结历史经验；（二）探索宇宙与人生的奥秘；（三）对社会提出安邦定国，甚至统一天下的方略，对个人提出修己治人的道理。由于当时思想界涌现出闪烁的群星，因而形成了许多伟大的学派，影响了几千年来中国历代的思想，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盛衰。

到了西汉，武帝以前仍袭先秦诸子的余波，虽已崇尚经学，但还未独尊儒术，因而西汉文章，作者辈出。到了西汉末年，儒术一尊，思想因之渐受禁锢，文学也随之渐趋衰敝。直至东汉末年，群雄角逐，法家与老庄学派崛起，加上曹氏父子崇尚文学，于是文坛又呈现出一派生动活泼的局面，到了西晋，玄言日盛，反映到诗歌上，正如钟嵘所说的：“永嘉（晋怀帝年号）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乃江表（江南，指东晋），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阐发道家思想的作品），建安风力（即风骨，指健康的内容和生动的形式的结合）尽矣。”（《诗品序》）这都说明，时代思潮给文学的影响是多么大了。

五 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文学的历史，自是不能例外。从我国文学史来看，最早的诗歌总集是

《诗经》，而其中的“国风”则是民歌。以后经屈原改写过的《九歌》，原是楚国民间的祭歌。从秦以后，任何一种新的文体的出现，追溯其渊源，没有不是从民间来的。汉以后的五七言诗，源于民间的乐府歌谣。至于宋代的词、元代的杂剧，以及宋以后的平话小说与章回小说，莫不如此。

不过民间文学，有其优点，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一般说来，在内容上情感真挚，爱憎分明，尤其是表现受压迫人民的那种不可遏抑的激愤的情绪和反抗的精神，能深深地震动读者的心。在形式上的破除陈规、敢于创新，语言上的生动形象，风格上的刚健清新，往往是一般文人所不能企及的。其缺点是，在内容上往往失之于浅近质直，而缺乏宏伟深邃的思想；在形式上，常不免失之于鄙俚庸俗，而鲜闳廓壮丽的伟大气魄。

至于士大夫中杰出的天才作家，他们富于文学教养，往往在生活中遭遇挫折，或生逢乱离，叹我生之不长，哀民生之多艰，于是借文学以抒发自己的幽愤，从而产生出能够反映出时代精神的作品来。就文学的体裁而论，一般有识见的作者，往往能从民间文学中取得新的样式，撷得新的语言，而予以加工改造与提高。如屈原之于《楚辞》，曹氏父子之于五七言诗，吴敬梓、曹雪芹之于小说。在这样的创作道路上，就产生了杰出的雄伟而壮丽的作品。但到后来一些庸俗拙劣的作者，对前人只知因袭摹拟，而不知改革创新，于是就产生了一些低劣的作品。因而这种文体也就到了末路。唐以后的诗，宋以后的词，就证明了这样的一个规律。

六 祖国文学与外来文学的关系

中国文学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最显著的有三次：（一）唐代的印度佛教文学；（二）晚清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学；（三）20年

代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

唐代佛教文学给中国文学的影响，是在清末发现了敦煌变文之后，经过研究后才清楚的。从变文看，我们了解到它和宋元以后的平话、词话、白话小说、宝卷、弹词和鼓词等，都有着程度不同的渊源关系，从而使我们了解到佛教从中世纪由印度传入中国，不只对中国哲学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同样在文学上的影响也是极大的。

到了晚清，西方的文学作品和文艺思想，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输入，也逐渐被介绍到中国来了。先进的作家在新形势下，开展了文学革新运动。发展到“五四”前夕，就爆发了“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文学革命的爆发，固然有其政治、经济的种种客观原因，而西方文学的输入，应该说也是这些客观原因之一。

由“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到1928年的革命文学运动，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又一次巨大的变革，显然这是由于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势不能不在文学上掀起一次更新的革命。左联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新文学又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而这一运动，正是大量地介绍了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论与文学创作的结果。

以上所谈，只不过就中国几千年来文学发展中所涉及的一些主要问题，和某些规律，略作说明，错误之处，望读者指正。

简论中国文化遗产中民主

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在50年代，我曾写了篇《论韩愈和柳宗元的散文》，谈到柳在当时的作家中是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因此表现在政治上，也

同样具有民主主义的倾向。首先在他的《封建论》中，认为封建制的产生，是由于统治者“私其力于己，私其卫于子孙”；批评郡邑制的产生，“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从这些批评中，就反映出柳宗元的人民立场。

其次是他对统治者与人民关系的看法，在《送薛存义之任序》中说：

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上者，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唯怠之，又从而盗之。

这同西方民主主义时代，把官吏称作人民公仆的看法，不是完全一样吗？

过去虽然对柳宗元这种思想有所认识，但对它的渊源，同它对后来的影响，并未进一步加以考查。最近因读《嵇中散集》中的《太师箴》，才进一步理解到子厚不仅在对封建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上，见解渊源于叔夜，即对中国历史发展的看法上，同叔夜也有其一致之处。

《太师箴》首先从中国原始社会有君民的关系时谈起，直到秦汉以后。而在秦汉以前又可分作几个阶段：从赫胥皇羲，到舜禹，这其间是有发展变化的，最初是“君道自然，必托贤明。茫茫在昔，罔或不宁。”继而是“默静无文，大朴未亏。万物熙熙，不夭不离。”后来到了唐虞，“犹笃其绪，体资易简，应天顺矩，絺褐其裳，土木其宇，物或失性，惧若在于。”那么为什么他们要禅让呢？是因为“统之者劳，仰之者逸，至人重身，弃而不恤。”但到舜禹之后就和过去情况大不相同了，箴中说：

下逮德衰，大道沉沦，智慧日用，渐私其亲，惧物乖离，擘□□仁，利巧愈兢，繁礼屡陈，刑教争施，天性丧真。季世陵迟，继体承

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谋国，不吝灰沉。赏罚虽存，莫劝莫禁。若乃骄盈肆志，兵阻擅权，矜威纵虐，祸蒙丘山，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丧乱弘多，国乃颠陨。

这里边所说的“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和“刑本惩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等等，不只对后来封建统治者的纵恣残暴进行了揭露与抨击，同时也说明君臣关系，以及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到后来已是极不正常了。所以在最后他提出：

故居帝王者，无曰：“我尊”，慢尔德音。无曰：“我强”，肆于骄淫。弃彼佞幸，纳此逆颜。谀言顺耳，染德生患。悠悠庶类，我控我告，唯贤是授，何必亲戚。顺乃造好，民实胥效。治乱之原，岂无昌教。

很显然，其抨击统治阶级的荒淫纵恣、荼毒人民，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提出人民的愿望，以及如何才能摆正君民关系，都为柳宗元人民本位思想之所本。但到柳宗元，讲得更加具体罢了。

至嵇康在本篇中从历史发展上看问题，也给柳宗元以极大的启发，所以他的《封建论》的论述，也用这样的观点。

从嵇康到柳宗元，这种人民本位的思想，到明末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原君》、《原臣》两篇，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在《原君篇》中，他从历史的发展中，说明许由、务光的辞天子之位，尧、舜居天子之位而又让贤，以及后来帝王之争夺天下，视天下为个人的产业的原因道：

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

正因为如此，所以梨洲在下边就痛斥后来的封建帝王道：

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

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

同时梨洲在下边也痛斥了后来无耻的儒者道：

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乃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

下边对封建帝王进行警告道：

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絨滕，固扁鵲”，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语公主亦曰：“若何为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创业时，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废然摧沮者乎！

最后得出“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世而不闻也。”

梨洲在《臣道篇》进一步申明君臣的关系，和君臣与人民的关系。君臣的正当关系应如何呢？他认为由于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所以“我之出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如果不是这样，把自己的出仕，完全看作为君之一身一姓，那就同宦官宫妾丝毫没有差别。所以他说：

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于仕于君也，不以为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

梨洲在这篇中，最精辟的见解，是所谓“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因此他对历史上朝代鼎革的看法，

和一般儒者的看法截然不同。他说：

是故桀纣之亡，乃所以为治也。秦政蒙古之兴，乃所以为乱也。
晋宋齐梁之兴亡，无与于治乱者也。为臣者，轻视斯民之水火，即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

这都是人民本位思想的具体体现。晚明诸大师中，只有梨洲这种人民本位的思想最为突出。章太炎极推顾炎武，而贬抑梨洲，他是从民族思想来评论顾黄的。但假若从民主思想这个角度来对他们进行比较，那么梨洲就远非宁人所能企及了。

到了晚清维新派的谭嗣同，在《仁学》中，又畅发梨洲这种民主观点。他说：

君统盛，而唐虞后无可观之政矣，孔教亡而三代下无可读之书矣！乃若区玉检于尘编，拾火齐于瓦砾，以冀万一有当于孔教者，则黄梨洲《明夷待访录》，其庶几乎！其次王船山之《遗书》皆于君民之际，有阴恫焉。黄出于陆、王，陆王将纘庄之彷彿，王出于周、张，周、张亦缀邹峰之坠绪。辄有一二闻于孔之徒，非偶然也。若夫与黄、王齐称，而名实相反、得失背驰者，则为顾炎武。顾出于程、朱，程朱则荀学之云祲也；君统而已，岂足骂哉！

这从民主思想上评价黄顾，扬黄而抑顾，应该说是有所见之言。因此他后边的观点，完全本于梨洲。如他说：

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

接着抨击过去为君的道：

岂谓举之、戴之，乃以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盘乐怠傲，骄奢而淫杀乎！供一身之不足，又滥纵其百官，又欲传之世世万代子孙，一切酷毒不可思议之法，由此其繁兴矣。

对于臣子所谓死节，他说：

请为大言断之曰：“止有死事的道理，决无死君的道理”。死君者，宦官臣妾之为忧，匹夫匹妇之为谅也。人之甘为宦官臣妾，而不

免于匹夫匹妇，又何诛焉！

这个看法，并未超出梨洲的论点之外。

晚清庚子以后（1904），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当时革命派也将法人卢梭的《民约论》介绍到中国。革命派刘师培，根据《民约论》的理论，与中国先秦以来哲人文士论君臣关系以及君民关系的言论相较，而写了《中国民约精义》一书。书中曾把黄宗羲的政治主张与卢梭相比较，最后归结为：

要而论之，梨洲之所言，为天下，非为一姓也。为万民，非为一人也。以君为国家客体，非以君为国家主体也。以君当受役于民，非为民当受役于君也。其学术思想，与卢氏同。本此意以立国，吾知其必为法美之共和政体矣。……中国自三代以来，官天下，变为私天下，政治之学泯然罔闻。君民尊卑，别若天壤。名位之说，深中人心。而梨洲独能以雄伟之文，醒专制之迷梦，虽其说未行于当时，诎得不谓为先觉之士哉！此吾所以崇梨洲为中国法理家也。

这个评价，的确是很高的！

这种以民为本位的思想，追溯其渊源，应该说是始于庄周。在庄子的《胠篋》篇中，认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而在《盗跖篇》中，对儒家所称道的一些圣帝名王，一一加以抨击道：

然而黄帝不能改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舜作，立群臣，汤放其主，武王杀纣，自是之后，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

像这种对历史发展的看法，以及对过去儒家所称道的圣帝明王的诋訾，即后来嵇康的“非汤武而薄周孔”之所本，也是他《太师箴》中对统治者残害人民给以揭露的思想的来源。嵇康曾说过：“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与山巨源绝交书》）即已充分说明，他的思想是本于道家的。